

# 中国的地名与地名研究

周 文 德\*

<目 次>

I. 引 论	IV. 中国地名研究的历史
II. 地名与地名的定义	V. 中国地名研究的现状
III. 地名学的研究内容	VI. 余 论

## I. 引 论

### 1. 地名的历史同语言一样古老

地名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社会活动的产物，是一个地域的历史见证和文化积淀，是一座城市的历史年轮和生活轨迹，是一种用特定的语言形式承载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

之所以说它是特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因为，人类探索世界认识自然的过程，从地名中可以得到反映；人类社会所经历过的战争、疾病、浩劫与磨难，在地名中有所体现；部落或民族的迁徙与融合，社会的发展与变革，自然环境的变化与演进，这些都可以在地名中找到证据。正是由于它有着丰富的语言、地理、历史、经济、民族、宗教、社会等科学内涵，古往今来，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地名产生了兴趣并展开了对地名的探讨与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名是人类盖在大地上的图章，地

\* 四川外语学院 教授、岭南大学校 中国言语文化学部 副教授

名的历史同语言一样古老。”<sup>1)</sup>地名是语言、地理、历史与文化诸要素的综合体，是人类生产、生活、交往和进行各种活动必不可少的工具，它浓缩和凝聚了一个民族文化多方面的内容。地名探索与研究在不同学科领域都能找到知音，是语言、地理、历史、考古、民族、宗教、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学科领域共同关注的课题。

## 2. 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越来越强的今天，地名作为文化遗产也应该加以保护，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明确表示：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许多国家都已把地名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当作地名科研工作的重要内容。全球性的地名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活动，正在兴起。联合国第六届地名标准化会议的9号决议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

地名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民族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文化心理、军事活动、交通变化、经济生活、政治变革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同时，“地名是人类各个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演变”<sup>2)</sup>。社会的发展变化归根到底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而地名的变化正可以揭示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变迁的轨迹。民族或部落的迁移与征服，往往会将原生居民的语言同化，从而使原生居民的语言消失。考察原生居民语言的证据主要来自地名。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在他的《语言论》里就曾经说：“在征服的情况下，保留在继存的强势语言里的文化借词主要是些地名。……地名给已消亡了的语言提供了宝贵的证据。”<sup>3)</sup>

- 
- 1) 范肃宁, <北京和华盛顿: 规划·地名·文化>, 《中国测绘》第3期(2004年)。
  - 2) 王际桐, <试论地名学的基本概念>, 《地名知识》第1期(1982年)。
  - 3)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商务印书馆, 1980年), 第571-572页。

## II. 地名与地名的定义

### 1. 地名是专有名词

地名是人类语言中普遍使用的专有名词。究竟什么是地名?它有着什么样的内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与阐释。有的从宏观角度对地名进行概括解释,有的侧重于从地理学角度说明,有的着重从语言学角度进行说明。归纳起来,主要有下面这些说法。

《中国大百科全书》将地名解释为:地名是人们在相互交流中为了识别周围的环境对位于地表特定位置上的地方所赋予的名称,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sup>4)</sup>

郭锦桴《汉语地名与多彩文化》认为,地名是人们赋予各种地理实体的指称,包括地方、地点、地物(地上建筑物、园林等)、地域、水域等等概念,它是泛指人类活动所在的各种三维空间的地理实体。<sup>5)</sup>

前苏联学者B.A.茹奇凯维奇《普通地名学》:地名“是在语言发展的一定阶段和比较晚的阶段上由普通名词形成的”,“过去和现在的地名均来源于经历了地理概念具体化和个性化过程的那些普通名词”。<sup>6)</sup>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地名是一定的社会群体为特定的地域所约定的专有名称。各种类别、各种层次的地名形成一定的系统,这些系统与地域的自然环境有关,反映了现实和历史的社會生活的特点。地名有命名时的初始意义,也有命名后随着地域的驰名而获得的特征意义,但地名最重要的基本含义还是在于指明一定地域的方位、范围和所属的地理类别。”<sup>7)</sup>

4) 杜祥明,《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5) 郭锦桴,《汉语地名与多彩文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6) B.A.茹奇凯维奇,《普通地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第9页。

7)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页。

## 2. 地名是语言词汇中的重要成员

地名学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交叉学科，地名主要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学中专有名词的重要组成部分。

地名通常是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组成。通名指明其所属的地理或行政类型，用于各种地名有相同的意义；专名是特称，用来区别同类地方的不同个体，包括该地在命名时代的某些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特征。如：重庆市、渝中区、沙坪坝、童家桥、嘉陵江、歌乐山、李家沱，其中的“市、区、坝、桥、江、山、沱”等是通名，除去通名的部分是专名。汉语地名，往往是专名在前，通名在后。

根据地名所指的地理属性，一般将地名分为自然地理实体名称和人文地理实体名称两大类，前者包括高原、平原、盆地、海洋、湖泊、江河、山峰、岛屿等名称；后者包括行政区域名，居民地名，各专业部门使用的台、站、港、场等名称，交通、水利等人工建筑名，名胜古迹、纪念地名等。

地名的历史同语言一样古老。地名一经出现，就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结下了不解之缘，就与不同时代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现象紧密相关。地名是语言词汇中的一个成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成员。日常生活中，人们天天都在与地名打交道。经常要问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都得用地名来回答。离开地名，人们将无法交流与生活。地名与地理、历史、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地名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便成了人类文化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地名作为语言词汇中的重要成员，与别的词汇的最大区别在于，地名都有一定的来历，即得名理据。地名得名由来一直都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是因为，地名的历史是民族文化历史的见证，地名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 III. 地名学的研究内容

#### 1. 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系统学问

有了地名,才有地名学。简言之,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系统学问,是以地名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具体说来,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由来、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和功能,以及地名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

地名在英语中被称为placename, place name或toponymy, toponomy。地名及地名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但地名学的产生却比较晚。中国的现代地名学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192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第2747页将英文“toponymy”汉译成“地名学”,这是“地名学”一词最早见于汉语当中,因此成为现代地名学在中国诞生的标志。<sup>8)</sup>

地名学的研究内容,概括地说,大致有3个基本方面:语言方面、地理方面、历史文化方面。

第一,语言方面。地名是语言词汇中的专有名词,对地名的研究是语言学工作的一部分。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L.R.Pamer)曾经说过的那样:“地名的考察实在是令人神往的语言学研究工作之一,因为地名往往能提供出重要的证据来补充并证实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论点。”<sup>9)</sup>地名由语词构成,从词汇学、词源学、语法学、语音学、语义学、文字学的角度,对地名进行语词分析,研究地名的语源、语音、含义、字形及其演变,有助于地名的正名、正字和正音工作。依据保留在地名中的古语成分,可以推论古语特征。对地名中方言词汇的研究,可以帮助确定方言的分布界限和词义。语言的民族性使地名研究为探索民族分布、迁徙、心理、习俗、信仰等提供资料。在科学的语言分析基础上,做好不同国家和民族地名的译写规

8) 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0页。

9) [英]帕默尔著,李荣等译,《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34页。

范化工作。

第二，地理方面。地名是特定地理实体的指称，地名不仅代表命名对象的空间位置，指明它的类型，而且还常常反映当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征。对古地名的位置进行考证，以及利用地名推测当地在历史时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对研究区域开发历史和地理演变(如海岸、河道、湖泊、植被、经济、生产等)，都是地名学研究在地理方面的课题。在研究聚落起源方面，地名资料更有价值。对地方性地名通名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当地的特殊地理景观和地理地貌特征。

第三，历史文化方面。地名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能保留较多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研究地名可以说明许多历史文化问题，对研究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交通、军事、宗教、文化等都有一定的帮助。

## 2. 地名学是多学科交叉的独立学科

关于地名学的学科性质，语言、历史、地理、测绘、民族等不同学界的学者，展开过激烈的学术争鸣。其意见大概有七种：

- (一)地名是一种语言代号，所以地名学应属于语言学性质的学科；
- (二)地名学主要以历史地名为研究对象，地名学应属于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 (三)所有地名全是由人们赋予的地域称谓，它是人地关系的一种反映，故地名学具有明显的人文地理学属性；
- (四)地名学属地理科学系统，它与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并列；
- (五)地名学是和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测绘学等多种学科有关的一门综合性的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
- (六)地名学从属于历史学的范畴；
- (七)地名学与地理、历史、语言、民族等学科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属

于一门边缘学科。<sup>10)</sup>

关于地名学学科性质,虽然至今仍未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但是,人们对地名的关注和研究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地名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其理论体系、研究任务和学科分类也是颇受关注的问题。杨光浴按地名研究内容将地名系统分成理论地名学、普通地名学、应用地名学和系统地名学等;<sup>11)</sup>褚亚平等按地名学研究的任务将其分为普通地名学、专门地名学、应用地名学和地名学史四大方面;<sup>12)</sup>路洪昌将地名理论体系从大的方面分成地名哲学、地名专业基础理论和地名学各分支学科理论,然后又对这三大方面进行了细细的划分,单地名学的各分支学科就按综合性、区域性、边缘性、方法性、部门性、应用性和技术性七个方面分成了数十门分支理论。如:按综合性分为地名起源学、地名演变学、地名通名学、地名结构学、地名类型学、历史地名学、断代地名学、社会地名学、文化地名学等,按方法性分为地名分类学、数理地名学、统计地名学、训诂地名学、比较地名学、地名区划学、地名层次学等。<sup>13)</sup>

在以上分类中,褚亚平等的分类方法受到更多人的赞同,将地名学按其研究任务分为四种。其中,普通地名学包括习惯上所称的“地名学概论”或“地名学通论”,以及地名学其他基础理论的研究,地名学方法论问题的研究等;专门地名学的研究则包括历史地名学、区域地名学、语言地名学等;应用地名学则包括地名管理学、地名信息学、地名文献学、地名辞书学等内容;地名学史包括中国地名学史、外国地名学史、民族地名学史等研究。

10) 褚亚平、尹钧科、孙冬虎,《地名学基础教程》(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第2页。

11) 杨光浴,《应用地名学》(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86年),第179页。

12) 褚亚平、尹钧科、孙冬虎,《地名学基础教程》(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第3页。

13) 路洪昌,《关于现代地名学理论体系的探讨》,《中国地名》第4期(1997年)。

## IV. 中国地名研究的历史

中国地名研究的历史虽不如地名的历史那么久远，但人们对地名的关注和研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尽管早期的地名研究不是系统的，而只是零星和附属的。

中国古籍中就记载了大量的地名，而且对许多地名的读音、含义、位置、沿革以及命名规律都有阐述。汉语“地名”一词最早出现于《周礼》。《周礼》系战国时代作品，汇编了周代官制及战国时期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周礼·夏官·遯人》载：“遯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隤、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从遯师的职责看，遯师当系周王朝专事地名管理的官员。其实，遯师所掌管的“地名”，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地名概念，而是指具体的丘名、陵名、坟名、衍名、隤名、隰名，《周礼》同一卷中还载“山师，掌山林之名”和“川师，掌川泽之名”。由此可见，山林之名和川泽之名都在当时的地名概念之外。很显然，在《周礼》里，“遯师”与“山师”、“川师”是并列的职官。“遯师”所掌管的“地名”只限于“丘、陵、坟、衍、隤、隰”，没有包含“山”名和“川”名。先秦文献中的《春秋谷梁传》就提出了“山南为阳，水北为阳”的地理命名原则。《尚书·禹贡》一书由“九州”、“导山”、“导水”及“五服”四部分组成，共1194个字，涉及地名150个左右，这些地名对后代的地名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地名研究，从历史角度来审视，有两种观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三阶段说”，二是“两阶段说”。

### 1. 三阶段说

以韩光辉为代表，认为，中国地名学的发展经历了古代地名研究、近代地名学探索和现代地名科学兴起与发展三个阶段。

中国古代地名研究，从先秦到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地名研究长期

处于史学、语言学和舆地学的附庸地位。即使到了封建时代后期,“中国地名研究虽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就研究内容而言,仍侧重于地名记录、地名渊源解释、地名沿革研究,某些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及若干地名规范化探讨等,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没有出现重要突破,也未能形成独立学科。这就是中国古代地名研究阶段的突出特点。”<sup>14)</sup>史念海教授在总结地名研究的这段历史时指出:“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在那时不仅不能独立自成科学,就是这样的名称也从来未曾见到有人提过。历史地理学稍胜一筹,还能以沿革地理之名爲那时学者齿及,地名学连这一点也是难于谈到的。”<sup>15)</sup>

中国近代地名学探索,自鸦片战争以后,至1960年代。以总结古代地名研究的成果、编纂地名工具书、探索地名规范化、介绍国外地名学理论及中国地名学理论的自我总结为主要标志,系现代地名学发展和成熟的准备与奠基阶段。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将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引入地名学研究是一个创新,取得了可喜成果,在前代奠定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理论研究与综合研究的趋势。

中国现代地名学研究,兴起于1960年代,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和发展,令人欢欣鼓舞。<sup>16)</sup>

## 2. 两阶段说

以华林甫为代表,认为,中国的地名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传统地名学和现代地名学两大阶段。分界线是20世纪30年代。

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地名研究是传统地名学阶段,20世纪30年代开启了现代地名学研究的新阶段。中国传统地名学以考释地名渊源为主要特征。这种特征先秦时代已露端倪,东汉时期以班固、应劭的著作为代表

---

14) 韩光辉, <论中国地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1995年)。

15) 史念海, <论地名学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1985年)。

16) 韩光辉, <论中国地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1995年)。

而渐趋完善，至南北朝、隋唐以降逐渐走向深入、成熟。明朝产生了专门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郡县释名》。明清时期，传统的地名研究成就达到了顶峰。现代地名学诞生以来，研究内容、范围扩大，涉及到了地名学的每一个方面，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地名进行了深入研究，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齐头并进，成果丰硕。

从汉代开始，学者们就不断致力于对地名渊源的解释。东汉时期，以班固、应劭为代表。班固认为“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从而撰成《汉书·地理志》，这是地名研究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全书记载地名4500余处，对其中的60余处作了渊源的诠释，并对部分地名的命名原由和名称演变作了说明，是最早系统地解释地名渊源的文献。此外，班固还对40来种地名通名作了归纳。应劭著有《汉书集解》、《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汉官仪》、《风俗通》等，涉及内容非常广泛，解释地名渊源168处，比班固的解释多了100多处，在班固基础上，丰富了传统地名学的内容。除班固、应劭外，汉代还有几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著录了地名信息并作了适当的诠释。许慎的《说文解字》收录小篆字头9353个，其中，“邑”、“山”、“水”三个部首下的地名用字就有872个，占了全书收录汉字总字数的近十分之一。《说文》中的地名可分为一般地名和山、水名称两大类，对地名的一些通名和专名进行了说解，如“澳，限崖也，其内曰澳，其外曰限”(通名)；“郑，京兆县周厉王子友所封，从邑奠声，宗周之灭郑，徙增消之上，今新郑是也”(专名)。《尔雅》是中国最早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作为一部词义类聚词典，全书共计13卷，分为19篇，其中《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4篇，是专门解释地理名称的。《释地》篇包括释九州、释十薮、释八陵、释九府、释五方、释野、释四极。《尔雅》对当时的“九州”地名释义道“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豳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扬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东汉末刘熙所著《释名》，体例与《尔雅》相似，共分8卷，释文27篇，其中《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合称《释地六篇》)，都旨在探讨地名的得名原由。刘熙在《释名·序》中

提出“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的原则，并指出“因形命之”的命名方式。很多释义十分精到，如“释水”篇中说“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海中可居者曰岛”。不少地名用字，说明了命名原由，如“释州”篇说“扬州，州界多水，水波扬也”，“凉州，西方所在寒凉也”，“荆州，取名于荆山也”。

东晋初年，郭璞对地名渊源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研究成果主要保存在《尔雅·释水》中，如“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对33处地名的渊源作过解释。如《巴志》江州县条下对“粉水”得名的解释：“县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为粉，则膏暉鲜芳；贡粉京师，因名粉水。”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了约15000个地名，其中对1050余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既涉及到自然地理部门的因山为名、因水为名等10项种类，也包含了人文地理部门的人物地名、史迹地名等14项类别，不仅引录了前人的规律性认识，而且还进一步归纳了一系列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精辟见解，有些论述已上升到地名学理论的高度，并且还在多处纠正了前人的错误，对于地名的音、形也有独到的看法。如卷二所载：“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太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仅仅是关于“郡”的命名就总结出了六个方面。

传统地名研究由起步走向成熟，则要数唐代李吉甫所撰的《元和郡县图志》(简称《元和志》)。该书除收录郡县名、说明其建置沿革之外，还标明了大小山水及有历史意义的地名，并涉及命名之由，对地名命名原则进行了详细的归纳和总结。《元和志》将地名命名原则分为“因水为名”、“因山为名”、“因原为名”、“年号为名”、“取其嘉名”、“因事名之”6类。如卷二九永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平陈，置永州，因水为名”。“因水为名”在《元和志》中出现了6次，并多次提到与之近似的“因川为名”，还对少数地名进行

了考证和辨析，如卷一七济水“源出贛皇山，西北流，去县南十里。此自别是一济水，应邵以为四渎，误也”。

宋初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记》等对地名的起源、演变、含义的阐述在今天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明代徐弘祖徒步考察各地山川，并作了详尽的记载。《徐霞客游记》描写了所经之地的地形地貌特征，并解释了地名的来历和含义。他将地名的命名原则分为15类，并对地名用字、地名读音进行了分析。关于地名用字，徐霞客在比较了贵州、广西的安笼、安笼千户所、安笼铺、安隆、隆安县等地名后指出：“大抵黔中多用‘笼’字，粤中多用‘隆’字”。关于地名读音，徐霞客既指出了某些地名的土音读法，也解释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名的读音。如广西向武州的百感岩，“在上流者曰白石寨，土音曰不汗，一作北岸”。此时，汉语地名的研究已经十分繁荣了。

明朝万历年间，郭子章所撰《郡县释名》，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郡县释名》以两京十三布政使司(省)为纲，以府、州、县为目，除少数地名“义未详”外，对当时有的1411个政区地名作了渊源解释，涉及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二十多个方面的内容。比如，他在河南开封府临颖县下写道：“颖乃一方之大川，故郡曰颖川，州曰颍州，而县曰临颖、颍阴、颍上，皆取此水为名”。除此之外，郭子章对区域地名特征、因水为名、地形地名、物产地名、美愿地名、人物地名、避讳地名、国号地名、地名通名、异地同名等传统地名学内容均有独到的见解，某些方面的创见已上升到地名学理论的高度。如“四井为邑，犹悒也。邑人聚会之称也，凡县名‘邑’者仿此。”这是对带“邑”字县名得名的规律性总结。

明代以后，各地普遍编修县志、府志，有的还再三修订，地名的研究已由民间走向官方，研究范围也日益扩大，传统的地名研究成就十分突出。

清代是中国地名研究的一个高峰期，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边疆的侵略，刺激了中国学者对边疆地名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如曹廷杰的《东三省舆地图说》、何应清的《滇南山水考

略》等等。其二，由于乾嘉学派考据之学的盛行，使这一时期的地名研究取得了颇多考证和地名沿革等方面的重要成果，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的资料。如现今重庆市境内有垫江县，县名的汉字写法与县城治所及其得名由来都曾经被历史误解。经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经学大师段玉裁详加考证，垫江县的汉字写法、县城治所、得名由来才得以彰明。他说：“今《地理志》、《郡国志》巴郡下皆作垫江县，盖浅人所改也。据孟康曰‘音重叠之叠’，知《汉书》本不作垫江也。垫江县在今四川重庆府合州。嘉陵江、涪江、渠江会于此，入大江。水如衣之重复然。故以垫江名县。”<sup>17)</sup>就连以专门解释地名渊源著称的《郡县释名》，都想当然地将后世误写的垫江县作了一番望文生义的解释。若无段氏的考证，这个误解也许还要延续很多年。

不过，尽管中国传统地名研究成果丰硕，但研究范围狭窄，主要是对汉语地名用字的训释和历史地理学的列举与说明，没有成为独立的学科。

中国的现代地名学酝酿于20世纪30年代。晚清以后，西方先进的地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清末翻译和出版了38部外国自然地理学著作和43部外国人文地理学著作，从而引进了大批汉语的学科新名词，如“地文学”、“地势学”、“气象学”。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地学知识继续传入中国，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地名学”一词问世。民国时期，传统的地名研究继续保持良好的态势，政府大规模地修改重复的地名，地名渊源的解释内容更加丰富，地名的考证更加发达和全面，现代地名学理论的探索、地名结构静态与动态的研究、地名分类的阐述、地名辞书的编纂、统一地名译名的讨论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专门研究地名沿革的“禹贡学会”及其所办刊物《禹贡》半月刊也在这一期间出现。这一期间，曾世英担任编辑绘制工作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出版，图集之后附有162页地名索引，把主要地名定位在地图，成为地图学和地名学的里程碑。金孟祖对地名学理论作了纵深的探索，1945年1月，他在《地名转译问题》一文中，直接指出：“研究地

17)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94页。

名的学问，称为地名学”。同年5月，他又发表了《地名学概说》一文，详细深入地探讨了一系列地名学的理论，他认为地名学分为三部分，一是训诂地名学，其目的在于解释地名的意义或寻求地名的来源；二是读写地名学，其目的在于确定地名的正确写法与读音；三是通论地名学，目的在于归纳地名在地理历史以至种族上、语言上的意义。

1950年代末，中国开始研究地名标准化，并从整体上研究地名的产生、发展和分布规律。1977年成立中国地名委员会，1979年召开了全国首次地名工作会议。1980~1985年开展全国地名普查工作，全国不少地方都根据地名普查的结果，编辑出版了以市、县为单位的《地名录》。如《四川省地名录丛书》，就出版了至少208卷。1981年全国各省的专家开始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1988年成立了中国地名学研究会。

## V. 中国地名研究的现状

### 1. 中国地名研究的新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地名研究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研究深入，视角广泛，成果丰富。开启了地名研究的新时代。

首先，在地名学基础理论和运用理论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例如，褚亚平主编的《地名学论稿》(1986)，邱洪章主编的《地名学研究》(第一、二集)(1984、1986)，杨光浴著《应用地名学》(1986)和《地名学简论》(1991)，马永立主编的《地名学新探》(1993年)，褚亚平、尹钧科、孙冬虎著《地名学基础教程》(1994)，王际桐著《地名学论稿》(1999)，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2002)，等等。

其次，中国学者们还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对地名进行研究，研究范围涉及历史学、地理学、方言学、词汇学、语音学、民族学、民俗学、语源学、信息学、翻译学、管理学、法律学等众多领域。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

究成果不断丰富。

历史学角度的地名研究,如孙冬虎、李汝雯著《中国地名学史》(1997),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史考论》(2002),徐兆奎、韩光辉著《中国地名史话》(1998)。文化学角度的地名研究,如牛汝辰著《中国地名文化》(1993),石水生著《湘西地名文化》(2001),郭锦俘著《汉语地名与多彩文化》(2004),周尚意、孔翔著《文化地理学》(2004)。社会语言学角度的地名研究,如张清常著《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1990)、《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1997),张惠英著《语言与姓名文化:东亚人名地名族名探源》(2002)。语言学角度的地名研究,如曾世英著《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1981),李如龙著《地名与语言学论集》(1993)、《汉语地名学论稿》(1998),吴郁芬等编《中国地名通名集解》(1993)。民族学、民俗学、语源学角度的地名研究,如雀丹著《地名与民族》(1992),王际桐主编《世界地名与民俗漫谈(亚洲卷)》(1993),牛汝辰著《中国地名由来词典》(1999),吕武进等著《南京地名源》(1991),北京市地名办主编《北京地名漫谈》(1990),孙本祥、刘平著《中国地名趣谈》(1995),万方祥、李希平著《环球地名趣谈》(1990)。信息学角度的地名研究,如浦善新主编《数字地名:地名信息系统的理论及其应用》(2000)。翻译学角度的地名研究,如国家测绘局、总参谋部测绘局制订《维吾尔语地名译音规则》。此外,还有从法律角度、管理角度的地名研究。

## 2. 新时期中国地名研究的特点

这一时期的地名研究,我们认为最引人注目的发展有三个方面的,一是地名工具书的编撰出版,二是语言学界对地名的研究热情,三是地名信息化建设发展迅速。

第一,一批高水平的地名工具书在这一时期问世了,如《辞海》的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三个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地理学、中国地理与世界地理三卷,《中国历史地图集》,《世界地名语源词典》,

《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国地名词典》，《中国历史地名词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等等。工具书的出版，标志着学科发展与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是，1980年代以后，地名研究引起了一些语言学家的关注，并被纳入汉语语言研究的范围，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专著也出版了。如前所述，从语言学角度研究地名的，如曾世英《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1981)，李如龙《地名与语言学论集》(1993)、《汉语地名学论稿》(1998)，吴郁芬等编《中国地名通名集解》(1993)。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研究地名的，如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1990)、《北京街巷名称史话——社会语言学的再探索》(1997)，张惠英著《语言与姓名文化：东亚人名地名族名探源》(2002)。时至今日，语言学界对地名研究的热情依然很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不断扩展。语言学界对地名研究的开拓，李如龙先生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如龙先生主张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汉语地名，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李如龙先生在《汉语地名学论稿》的自序中说：“时至今日，如果还像以前那样，以为地名研究只是运用地理学、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不是按照理论逻辑和实际需要，把地名研究真正建立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显然是很不合时宜的了。”所以，“只有运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建立科学的地名学。”他还引述了中国地图学和地名学奠基人曾世英先生为他的《地名与语言学论集》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这段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他说：

地名是语言中的专有名词，它和语言中的其他专名(例如人名)有相同的特点，又有不同的特点。地名的构成有一定的语法规律，地名用字的分布和民族语、方言的分布密切相关，地名的书写和称说可能存在不同的变体，对历史地名的考释必须从字的形音义入手，对当代地名的标准化处理，也必须联系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所有的这些都说明了地名

学的研究和语言学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语言文字学的种种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于地名学的建立也是不可或缺的。遗憾的是,语言学家们从事地名研究的至今还只是凤毛麟角。<sup>18)</sup>

在曾世英先生的倡导和李如龙先生的带动下,语言学界对地名的研究开始热闹起来,可以说是老中青学者们共同努力开拓着这一块崭新的领域。经过短时期的努力,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特别是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第三个引人注目的发展是地名信息化建设发展迅速。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的发布与获取周期越来越短,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科技一日千里,资讯瞬息可达。地名管理与信息化建设依靠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而步入了跨越式的发展道路。1991年,民政部成立了区划地名司,使中国地名管理工作进入了政府统筹管理的行政轨道,1998年,中国行政区划地名研究会成立了,这两件大事是中国地名研究与管理的重大转折,为中国地名的现代化管理奠定了基础。

信息科学、空间科学、数字通讯等现代科学技术与地球科学的不断交融,催生了“数字地球”,极大地推动了地名信息化的发展。地名信息系统是“数字地球”最基础的地理信息数据,随着各国日益重视“数字地球”的建设和升级,地名信息系统建设也得到了飞速发展。现在,全世界都在重视地名的数字化建设;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专门设立了一个工作组来协调地名信息化的建设工作,这个伴随着新技术成立的“地名数据自动化处理工作组”,已经做出了许多建设性的贡献。已有不少国家建立了国家级地名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Names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NIS),100多个大型地名数据库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许多发达国家更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不断完善GNIS、更新、扩充地名数据库。世界地名数据库的建设,已广泛应用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各个领域,在经济合作、交流及竞争,政治斗争、外交活动、军事行动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18)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自序》(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

用。<sup>19)</sup>

中国于1998年设立地名信息系统研究室，并启动了中国地名信息系统的建设(CGNIS)。自工程建设以来，已经取得可喜的成绩。制定了中国地名信息系统建设的总体框架和功能设计，地名排序字库也基本建成，还制定、颁布了《地名分类与类别代码编制规则》国家标准。地名信息系统通用软件——“地名之星”研制第一期工程顺利完成，并已投入使用。<sup>20)</sup>地名属性数据和空间数据日益充实。地方性的地名信息化建设也在快速推进，“数字地名”已经迈入多个省市，重庆、北京、天津、上海等多个城市被民政部评为全国“数字地名”服务示范城市。2005年以来，区划地名司已连续多年将地名信息化工作列入了地名工作计划的重点，强调要加紧省、市(地、州)、县和全国的四级地名数据库的建设。中国的“国家地理信息系统”中的“数字地名”通过将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上各类地名注记，包括居民地、河流、湖泊、山脉、山峰、海洋、岛屿、沙漠、盆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名称，连同其汉语拼音及属性特征，如类别、政区代码、归属、网格号、交通代码、高程、图幅号、图名、图版年度、更新日期、X坐标、Y坐标、经度、纬度等录入数据库中，建成了地名数据库。此地名数据库不仅可以作为单独的关系型数据库运行，也可与地形数据库之间通过技术接口码连接，实现相互访问。<sup>21)</sup>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数字地名”一定会为中国的现代建设事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新技术革新带来地名研究与管理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地名研究的生力军正在形成和壮大。近十年来，一大批年青的学者加入到了地名研究的阵营中来，为地名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一批青年博士和硕士，以地名研究为学位论文选题，丰富了地名研究的内涵和外延。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位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达到了四五十篇，研究范围既有现代地名研究，又有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物、出土文献中的地名研究；既有地名

19) 浦善新, <数字地球与地名数字化>, 《行政区划与地名》第1期(2000年)。

20) 浦善新主编, 《数字地名——地名信息的理论及其应用》(新华出版社, 2000年)。

21) <http://ngcc.sbsm.gov.cn/>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又有地名管理研究。有从语言、文化、经济、历史、地理、民俗、民族、法律、人工智能等各个角度的研究,其中,从语言文化角度研究的成果尤其引人注目。

由此可见,新时期的地名研究已不再是冷门学科,也不再是一门边缘化的学科,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大大超过以前,它已经成了一门与社会服务及经济建设息息相关的热门学科。地名与地名学研究越来越广泛与深入。

## VI. 余论

地名学作为一门学科是19世纪后期,首先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出版了地名学研究专著,建立了地名研究专门机构。中国早期的地名和地名学著作,与中国古代的地名研究一样,都着重于地名的记述和语源考证。现代地名学诞生以来,美、英、法、前苏联、日本等国,走在了地名学研究的前列。

我们认为,中国的现代地名学研究,真正走上正轨始自1980年代。几十年来,经过语言、历史、地理、测绘、民族、文化等不同学界的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颇有些后来居上的趋势。

中国的地名研究,从单纯的地名得名由来解释,到多角度全方位研究地名;从附庸地位到独立学科的发展,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时至今日,地名研究的队伍和成果都远非过去所能比。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地名研究还相对落后。特别是,站在中国的国情角度看,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方言纷歧,是世界上地名数量最多的国家,堪称地名资源的“富矿”。另一方面,中国现代的地名研究还相对落后,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的地名研究。既没有分地域的系统的地名研究,也没有分层级的整体的系统的地名研究。不少地域的地名研究还是空白。在地名管理和历史地名保护方面,

我们的工作也才刚刚起步。不珍重历史和文化，随意更改地名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遏止。所以说，相对于中国地名资源的“富”而言，地名研究却显得相对的“贫”。新世纪里，这种“富”与“贫”的矛盾应当得到平衡。这就需要更多的学者关注地名研究。

地名是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人类的宝贵遗产。不管怎么说，地名学都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地名研究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需要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通力合作，彼此借鉴，参互证发。地名研究的成果，并不仅仅属于某一门具体学科，而是多学科多领域所共有。同时，地名学研究往往与国家、地区或地域的经济文化建设息息相关，地名学研究的成果往往被经济和文化旅游部门所采纳，为提升地域或城市的知名度起着独特的作用。

当然，无论是就其学科性质、学科定位，还是就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抑或是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而言，中国的地名研究都还需要进一步地深入探讨。只有把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搞透彻了，真正独立的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地名学才算建立了起来。

### <参考文献>

- [美]布龙菲尔德，《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  
[苏]B.A.茹奇凯维奇，《普通地名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3年。  
(汉)司马迁等，《二十四史》(缩印本；中华书局)，1997年。  
(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  
(晋)郭璞注，袁珂点校，《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中华书局)，2009年。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1988年。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

-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  
(明)郭子章,《郡县释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6年。  
(明)徐霞客,《徐霞客游记》(中华书局),2009年。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韩光辉,《论中国地名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北京社会科学》第4期,1995年。  
孙冬虎、李汝雯,《中国地名学史》(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  
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

### <Abstract>

Place names are proper nouns widely used in human languages. They are not only a special cultural phenomenon expressed in a specific language form but also living fossils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y are 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and are a target that attracts widespread attention from multiple disciplines such as linguistics, geography, history, archaeology, ethnology, religion, economy, sociology, and culture.

Toponymy is a scientific study of place names from the aspects of linguistics, geography, and cultural history. Toponymy is an independent yet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Although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in China is not as long as the history of place names,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still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despite the fact that in early the names the study is not systematic but just sporadic and supplementary.

About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in China,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wo kinds of theories worth our concern: one is

three-stage theory and the second is two-stage theory.

Since the end of the 1980 s,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in China embraces a new era. The most spectacular development involves three aspects: One is that many reference books for place names are compiled and published; second is that linguists show great enthusiasm in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third is that place name informatization is experiencing rapid growth. Especially, language scholars' study of place places attracts great attention.

Compared with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 lags behind in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On the one hand, with a long history, an extensive territory, diverse nationalities, and various dialects, China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place names in the world and can be called a "rich ore" with abundant place names.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has no modern or systematic study of place names. China neither has a regionally systematic study of place names nor hieratically systematic study of place names. Many regions have no study of place names. We just start to manage place names and protection historical place names. Therefore, compared with the "richness" of place names,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is very "poor". In the new era, this "richness" and "poverty" contradiction should be balanced. This needs more attention from language scholars to study place names.

Regardless of its disciplinary nature, discipline orientation, study contents and methods, or its theoretical system, is concerned,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in China need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Only when we make clear these problems and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modern discipline can the study of place names be really built up.

Key Words : place name, study, language, culture, China